

企业家精神与地区出口比较优势*

李小平, 李小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企业家精神是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本文通过构建省级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利用中国2009—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显著提升了中国地区出口比较优势。在处理了企业家精神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利用分位数回归和替代性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后,该结论具有很强的稳健性。其中,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地区出口比较优势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而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呈现单调递增性;对影响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各地区法治水平和政府管制在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出口比较优势效应中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不确定性规避代表的文化态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出口比较优势效应存在正向反馈机制。本文的结论表明,构建有利于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制度设计和法治环境,对于各地区提升贸易竞争力而言不可或缺。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出口比较优势;法治水平;政府管制;不确定性规避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7)09—0066—16

一、引言

Schumpeter(1934)的企业家理论产生以来,学术界主要围绕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经济效应展开了一系列分析,包括就业效应(Gilbert等,2004;Cumming等,2014)、知识溢出效应(Audretsch & Keilbach,2004,2005)、经济增长效应(庄子银,2005;李宏彬等,2009;Cumming等,2014;González-Pernía & Peña-Legazkue,2015)等。这些研究侧重于企业家精神对国内市场的影响。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参与全球化已成为普遍现象,然而,企业家精神对国际化参与的影响,尤其是对参与出口的影响尚缺乏研究(Chaisingharn & Nguyen,2016)。全球创业观察(GEM)200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富裕国家中高达40%的初期创业者估计他们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客户来自国外。这较早证实了企业家精神与贸易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

改革开放激发了人民的创业创新热情,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积极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为我国贸易发展不断注入活力。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为扩大贸易和应对国际竞争,我国各地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学习、汲取国外的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建立更多的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更多种类和更高质量的产品,甚至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开辟更广阔的市场,无疑孕育着巨大的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2017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各国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着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单纯依靠消耗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对外贸易的做法已落后于时代。随着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和释放,它对各地区的出口比较优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企业家精神能否成为中国贸易竞争力提升的驱动力?它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利用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为中国情境下企业家精神的出口比较优势效应提供经验支持。

收稿日期:2017-05-30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碳生产率变动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演进的影响研究”(14BJL05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课题“外贸发展与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互动机理及其政策选择”(12YJC79010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重点科研创新项目“创业、创新与出口增长”(2015BZ0301)。

作者简介:李小平(1974-),男,湖南邵阳人,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是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E-mail:chineselxp@126.com;李小克(1986-),男,河南南召人,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E-mail:lixiaokeyanwu@163.com。通讯作者:李小克。

二、文献综述

理论上,企业家精神与贸易之间存在内在联系。Schumpeter(1934)从企业家精神出发,将经济发展看作是企业家“创造性破坏”的内生动态过程,即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通过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建立新生产组织结构等推动经济增长。在开放条件下,企业家精神突破国内市场的限制后,在国外建立新的组织,进行投资、研发、生产和销售。因此,开辟新市场不仅是企业家精神的表现、内容和手段,而且就市场范围而言,开辟包括国际市场在内的新市场,往往意味着企业家精神可能与国际贸易存在关联。随着新贸易理论的日臻完善,企业家精神与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如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随着产品及其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演进,比较优势会发生动态转移,国家间的贸易方向和地位将发生变化。如果将外商市场主体在东道国开办企业、投资、收购和研发的生产行为视为一种外来市场主体的企业家创业、创新活动,那么该理论的含义可以拓展为外商直接投资主体的企业家精神与东道国的贸易增长存在某种动态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化假定遭遇空前的挑战,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愈受重视。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创新内生化,进一步阐述了企业家创新是增长的源泉和动力。竞争优势理论则从国家和产业层面说明,企业家活动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的竞争优势、贸易优势。为此,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家精神在提高效率和生产率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新企业通过竞争和市场选择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企业家创业创新活动的增强,管理、技能经验的积累,通常表现出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强的产品竞争力。如Baumol(1990)从竞争观点解释了新建企业能够促进现有企业更有效率地运行。

在经验研究中,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逐渐在实证分析中得到了重视,对于企业家精神与出口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企业家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及对市场机会的识别(Hébert & Link,1989)。现有研究通常对企业家精神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分解,主要从出口绩效、出口增长、出口强度、出口倾向等方面实证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出口贸易效应。

企业家精神对出口绩效的影响研究是目前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关系中最广泛的细分研究领域。Leko-Simic & Horvat(2006)从企业家精神的风险承担角度出发,从风险承担倾向偏低角度解释克罗地亚出口绩效恶化现象,企业的年龄、规模和类型是克罗地亚出口企业风险倾向的决定因素,高的风险承担倾向意味着企业家精神会改善出口绩效;Etchebarne等(2012)利用影响企业家精神(创新、冒险和主动性)的环境变量(活力、敌意和异质性)和内部变量(企业的年龄、规模和结构)的结构模型,对智利108家出口企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出口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Chaisingarn & Nguyen(2016)以200位泰国家族企业经理作为研究样本,从自主性、创新、冒险、积极性和竞争进取性的角度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显著影响出口绩效;Abiodun(2016)对尼日利亚中小企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导向与出口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关于企业家精神对出口增长的影响研究是另一个关注较多的话题。Fabling & Sanderson(2010)利用新西兰企业层面数据表明,新的市场进入是整个出口贸易增长的贡献来源,但更大范围的贸易主要由现任企业发起;Lederer等(2016)利用哥斯达黎加1997—2007年微观数据,研究了企业家精神与出口增长的粗放边际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特别强调贸易的粗放边际,包括新的出口企业、新产品、新的出口市场以及新产品与现任产品的单位价值。研究表明,一些新企业退出出口活动与其经营业绩、商品出口价格的持续恶化相关,而大多数新增出口产品与现任出口企业有关。

多数研究结果支持企业家精神越强烈,出口越显著的假设(Fabling & Sanderson,2010),但是,企业家精神对出口绩效和出口增长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对出口绩效影响的差异。Ezirim & Maclayton(2010)的一项研究表明,创业精神导向对出口绩效有微弱的影响,而创新精神对市场份额增长有负面影响;Khalida & Bhattib(2015)构建的理论模型表明,创业能力在企业后续的出口扩张阶段发挥积极的影响,企业家的反应、冒险和创新精神直接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但企业家精神也会通过中介变量效应间接影响出口绩效;Cho(2014)使用风险承担和创新的两个企业家精神要素,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对韩国新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出口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企业家创新精神影响出口绩效,但企业家的风险承担和创新精神正向影响其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在企业家精神和出口绩效之间充当中介作用。

最近还有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家精神对出口倾向、出口强度的影响。Muñoz-Bullón 等(2015)认为,企业家精神导向(主动性、冒险和创新)是企业家进入国外市场的重要决定因素,他们使用美国和欧盟 2001—2008 年新生企业家数据,研究表明,新生企业家的出口倾向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正相关;Cumming 等(2014)利用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的 125 个国家 2004—2011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新建企业每增加 1%,出口/GDP 增加 0.03 个百分点,企业家精神对出口占 GDP 的比重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后者还使用 Compendia 数据库中 11 个欧美发达国家 2004—2009 年的数据得到了相似结论,但使用 OECD 24 个国家 2004—2007 年的数据时,得到了完全相反的推断。对此,他们认为,OECD 数据对于评估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效应是不完整和不合适的。

无论是出口绩效,还是出口增长、出口倾向、出口强度,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出口比较优势相联系,但它们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出口比较优势的变化。出口绩效、出口增长和出口强度提升能够反映出口规模扩大,但并非必然意味着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只有当出口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体现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一个地区在某种产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往往是因为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从而专注于生产和出口该种产品,参与国际贸易分工。这也意味着其能够占据较大的出口市场份额,代表着国际市场对该种产品的认可度和需求强度。由于出口增长、出口倾向、出口强度与出口比较优势存在很强的联系,那么企业家精神对比较优势产生何种影响呢?沿着这个逻辑思路,本文将企业家精神对出口绩效、出口增长、出口强度的影响扩展到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在经验研究中,本文使用 Balassa(1965)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方法,结合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区域所课题组(2001)提出的采用区位商指数来识别各地区比较优势区位商的思想,计算了地区层面上的出口比较优势,并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分别检验两者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据本文所知,这是文献中首次关于企业家精神与出口比较优势关系讨论中最直接的经验研究。在本文的研究中,还充分考虑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地区人均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数量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并利用 GMM 估计克服动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现有研究对企业家精神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未给予充分的重视,普遍忽视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和外资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的存在;其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国家,企业家精神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企业家精神也会受到对外贸易的驱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企业家精神由此产生和发展,这表明,企业家精神既可以是贸易发展的原因,也可以是其造成的结果;其三,实证模型中存在不可观测的变量与企业家精神相关,且影响出口比较优势的变量归入随机误差项,由此带来的遗漏变量偏误可能导致企业家精神变量的内生性。由此可见,内生性是实证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其讨论和处理显得十分必要。此外,本文还利用现有条件下可获得的权威数据,检验了中国情境下法治水平、制度水平、与风险相联系的文化因素在企业家精神的贸易效应中的调节作用,通过企业家精神对出口比较优势影响的机制分析,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

三、研究方法

1. 地区出口比较优势

衡量出口比较优势不仅考虑产品出口额,还要考虑出口结构。现有文献中对出口比较优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对一国内部地区层面的研究尚缺乏。一国内部地区的比较优势的衡量须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内涵,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区域所课题组(2001)提出采用区位商指数来识别各地区比较优势。区位商法将各地区的产出结构放在一国空间系统中,以整个国民经济产出结构作为参照系来判断各地区各行业产出结构与整个国民经济产出结构的差异,进而表明各地区各产业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以及进出口规模的大小。从贸易角度看,区位商法与 Balassa(1965)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计算方法是一致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测度出口比较优势应用最广泛的指标。本文借助区位商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造一国地区层面上的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首先,计算某地区某行业的产品出口比较优势:

$$RCA_{ijt} = \frac{Exp_{ijt} / \sum_j Exp_{ijt}}{\sum_i Exp_{ijt} / \sum_i \sum_j Exp_{ijt}} \quad (1)$$

式(1)中, i, j, t 分别表示省份、行业和时间; Exp 表示产品出口额; i 省 j 行业的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等于该省 j 行业的产品出口额 Exp_{ijt} 占该省全部行业的产品出口总额 $\sum_j Exp_{ijt}$ 的比重与全部省份 j 行业的产品出口额 $\sum_i Exp_{ijt}$ 占全部省份全部行业的产品出口总额 $\sum_i \sum_j Exp_{ijt}$ 的比重之比。若 $RCA_{ijt} > 1$,意味着 i 省 j 行业的产品出口具有比较优势;反之, $RCA_{ijt} < 1$,表明 i 省 j 行业的产品出口具有比较劣势。

其次,计算 i 省全部行业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指数需要考虑不同行业的产品出口结构及其竞争力差异。因此,以 i 省 j 行业的产品出口额占全部省份全部行业的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权重,得到 i 省全部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总指数:

$$RCA_{it} = \sum_j \left(RCA_{ijt} \times \frac{Exp_{ijt}}{\sum_i \sum_j Exp_{ijt}} \right) = \sum_j \left(\frac{Exp_{ijt}}{\sum_j Exp_{ijt}} \times \frac{Exp_{ijt}}{\sum_i Exp_{ijt}} \right) \quad (2)$$

显然,出口行业越多,有竞争优势的行业越多,该地区总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就越大,相比单纯使用出口总规模,更能准确地反映地区的出口贸易竞争力。本文计算全部国民经济大类(即代码为两位数)统计用产品出口^①,各省份各类行业出口贸易额来自EPS整理的《中国地区贸易数据库》。由于中国海关对于分省份分行业的出口数据公开报告始自2009年,因此,本文将研究区间设定为2009—2015年。根据式(2),本文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区)各年45个国民经济两位数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最终求得各省份各年度出口比较优势总指数。

2.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但不限于创业意识、创新意识、冒险意识、竞争意识、合作意识、机会敏锐性等。然而,迄今为止,对企业家精神,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清晰而全面的定义(李宏彬等,2009;朱彤等,2015),企业家精神理论在定义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方面还存在问题(欧雪银,2009)。在经验研究中,很难对企业家精神的全部内涵进行准确的量化测度。因此,本文遵从现有的实证研究做法,通过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划分,选择一些侧面进行研究。按照Hébert & Link(1989)的划分,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活动方面的表现可以区分为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

(1)企业家创业精神。在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测算上,现有文献主要遵循Schumpeter(1934)的企业家理论框架,选择新生产组织表示企业家创业精神。主要包括新企业数占人口数或企业数的比率(Audretsch & Keilbach, 2004; Virgill, 2008),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Foster等, 2006),新增民营企业数量(蒋含明、李非, 2013)。根据内部企业家精神的解释,新生产组织并非一定要成立新的企业,如Glaeser(2007)、Audretsch等(2010)使用企业数量或小企业数量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上述指标实际上是从企业数量变化的角度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侧重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直接效应。一些研究从劳动力数量视角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Beugelsdijk & Noorderhaven(2004)使用自我雇佣比率表示企业家创业精神;李宏彬等(2009)、程俊杰(2016)均使用个体和私营企业工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率作为企业家创业精神的代理变量。

对于像我国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不够成熟的中国国家来说,仅利用企业数量来衡量可能造成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有偏性。这是因为,制度因素在市场准入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2004年为2350万户,五年减少810万户。实际上,这种减少是登记制度变化造成的数据波动,绝非意味着该时期企业家创业精神萎缩。另外一个典型的事实是2014年我国实施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放松了对市场主体准入管制,市场主体数量超高速增长,极大地释放了创业活力,但根据国家工商总

^①共计45个行业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邮政业,环境管理业,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文化艺术业。

局对 2015 年四季度新设立的小微企业周年调查问卷分析表明,新设小微企业周年开业率 70.8%。由此可见,仅由企业数量来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既存在低估的可能性,还可能无法识别出创业成功与否,将一些无效且多余力量涵盖进来而高估。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测度不仅需要关注像企业形成这样的数量效应,还应考察企业成长过程中是否创造社会价值效应,后者是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创业成功与否及其大小的重要标志。

通过以上讨论,结合李宏彬等(2009)的研究,本文的企业家创业精神是指任何建立新企业的行为它主要包括个人层面和公司(企业)层面的企业家创业精神,主要表现为建立新(子)公司,促进企业数量增加、扩大雇佣规模。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并不区分个人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公司企业家创业精神,而是考虑两类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总和。结合上述两类代表性的测算方法,本文基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数量效应和就业效应,构建省级层面的企业家创业精神指数:

$$BE_{it} = \frac{Qua_{it}}{Pop_{it}} \times \frac{Emp_{it}}{Emp'_{it}} \quad (3)$$

式(3)中, i, t 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 Qua_{it} 、 Pop_{it} 分别为 i 省的私营和个体户企业数、总人口数; Emp_{it} 、 Emp'_{it} 分别为 i 省的私营和个体户企业就业人数、全部就业总人数; $\frac{Qua_{it}}{Pop_{it}}$ 表示省级层面人均企业数量,反映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数量效应; $\frac{Emp_{it}}{Emp'_{it}}$ 反映省级层面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就业效应; BE_{it} 指标既包含了企业家创业活力,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仅依靠企业数量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时可能存在的无效创业和低水平创业活动的干扰,兼顾了企业家创业精神体现出的数量和就业效应。各省份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企业就业人数、各省份就业人口数、各省份私营和个体户企业数、全国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企业数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精髓。企业家创新精神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和公司进行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实证研究中,主要利用专利申请量或发明数量衡量企业家创新精神(Acs, 1996; Wong 等, 2005; 李宏彬等, 2009; 杨勇等, 2014)。专利申请量反映了创新的积极性,但不能区分是否为有效专利,因为一些专利申请不能获得授权,所代表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可能是无效的。从统计数据来看,1999—2015 年间我国专利授权量占申请量的比重大多数年份介于 50% ~ 70% 之间,未获授权的专利反映了创新意愿,但往往不能反映创新能力和水平,可能会高估企业家创新精神。因此,本文基于每万人的专利授权量构建省际层面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指数。各省份专利授权量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份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同样,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并不区分个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公司企业家创新精神,这也便于利用现有统计数据实证研究。

(3)企业家精神与地区出口比较优势。如图 1 所示,除北京、天津、云南外,2009—2015 年各省份出口比较优势总指数的均值与各省份企业家创新精神指数均值基本上呈现出高度相似的轨迹,除天津、河北外,各省份出口比较优势总指数的均值与各省份企业家创业精神指数均值也保持近似一致的运动轨迹。企业家精神越丰富的地区,其出口贸易比较优势往往也越大,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相比河北,北京作为企业家创业创新更为活跃的地区,其出口比较优势指数均值低于河北,这可能是由于北京是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其工业比重小,因此,商品出口规模相对较小,出口比较优势相对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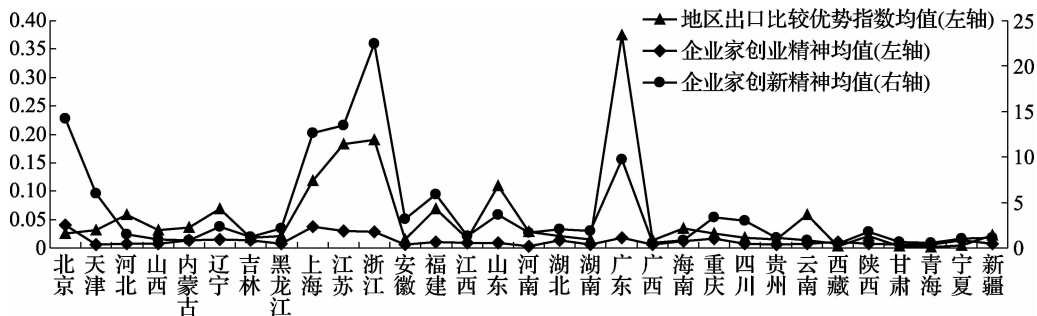


图 1 2009—2015 年中国各省份企业家精神指数均值和出口比较优势指数均值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绘制

3. 计量模型构建

Cumming 等(2014)建立了一个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效应模型,用于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失业、出口和创新的影响。为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本文借鉴 Cumming 等(2014)的思路,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A_{it+1} = \alpha_0 + \alpha_1 BE_{it} + \alpha_2 IE_{it} + \delta_i V_{it} + \mu_{it} \quad (4)$$

式(4)中,以提前一期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作为因变量,主要是考虑到企业家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对出口比较优势的滞后效应以及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为降低遗漏重要变量的影响,加入其他影响出口比较优势的变量,主要有^①:

(1)资本深化(KL):资本深化反映资本—劳动要素结构的变化,地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上升,意味着该地区投入更多的机器设备到生产中去,其具有的技术越多越先进。Cole 等(2005)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强度与产业比较优势正相关,但随着物质资本强度的增加,其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李小平等(2012)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强度与贸易比较优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用资本劳动比表示资本深化,其中,地区物质资本存量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如下:

$$K_{it} = I_{it} + (1 - \sigma_{it}) K_{it-1} \quad (5)$$

式(5)中, K_{it} 、 I_{it} 分别表示固定资本存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σ_{it} 为折旧率,参考单豪杰(2008)使用的省级折旧率研究,本文统一取值为 10.96%;单豪杰(2008)估算了 1952—2006 年各省份资本存量数据,本文利用其 2006 年的结算结果,计算 2007—2015 年各省份固定资本存量数据,再利用各省份固定资产形成价格指数平减为 2008 年的不变价格;地区劳动力数据由各省份就业人员数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人力资本强度(HC):人力资本是劳动者通过教育、培训和实践经验等获取的知识技能的积累。通常,一个地区人力资本越丰富,代表的劳动生产效率越高,有利于提升贸易竞争力。人力资本通常使用工资水平、受教育程度、科技活动人员数量等表示。借鉴李小平等(2012)的方法,本文使用各省份 R&D 人员全时当量(人年)占该省份就业人员数的比率作为人力资本强度的代理变量,R&D 人员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3)知识资本强度(KC):知识资本是以知识形态方式存在的资本,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知识性和技术性的投入量。知识资本的积累和应用对技术进步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本文使用各省份 R&D 经费内部支出占其 GDP 的比重表示地区的知识资本强度。其中,使用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 R&D 经费进行平减(2008 年 = 100),并利用 GDP 平减指数求得以 2008 年为基期的实际 GDP,R&D 经费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4)环境规制强度(ER):污染避难所假说(PHH)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强度会使企业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其他方面的投资减少,产生了挤出效应,其结果是增加生产成本,降低其比较优势。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但从长期来看,合理的环境规制将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于现阶段环境规制主要针对工业领域,且污染治理投资并不代表当期实际投入,因此,本文使用各省份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占其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其中,利用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求得实际的污染治理投资,用各省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计算实际工业增加值,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5)其他变量。产业结构(IS):国际贸易主要由制造业驱动和服务业驱动,但我国服务贸易长期落后于货物贸易。由于我国服务贸易比重偏低,货物贸易占主导地位,因此,本文使用各省份工业增加值比重占其 GDP 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②。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某一地区,不仅获取了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还将通过技术知识溢出和产业关联影响该地区的比较优势。本文使用各省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

^①实证中,一些控制变量如资本深化、对外直接投资等与出口比较优势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鉴于主要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而且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我国各地区普遍存在资本过剩的现象,故对非线性问题不再做进一步研究。

^②据中国海关总署官网的统计数据显示,2001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5098 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674 亿美元,服务贸易为货物贸易总额的 13.2%。2016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24.33 万亿元人民币,服务贸易 5.35 万亿元人民币,服务贸易为货物贸易的 22.0%。

占其 GDP 的比重表示,其中,利用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进行价格因素剔除,FDI 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 (OFDI): 早期理论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存在替代的关系,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产业转移促进了国际贸易,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蒋冠宏、蒋殿春(2014)利用微观层面的工业企业数据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而毛其淋、许家云(2014)从微观层面证实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创造效应。地区层面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比较优势之间存在互补还是替代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本文使用各省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实际额占其 GDP 的比重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变量,同样使用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做价格因素剔除,OFDI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首先,将企业家创业精神变量 (BE) 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变量 (IE) 分别作为外生变量进入计量模型(如表 1 前 4 列所示)。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看出,企业家精神对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企业家创业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均能够促进出口比较优势的提高。这一结论与研究企业家精神对出口影响的文献结论类似,也符合本文的预期。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强度、知识资本强度与显示性比较优势正相关,这符合 H—O 贸易理论有关资本、劳动要素对比较优势影响的解释。环境规制强度与显示性比较优势显著负相关,这支持了污染避难所 (PHH) 假说,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金属制品(如钢铁)等诸多传统行业的出口恶化^①,在此期间,各地产业结构相继进入一个全新的调整时期,淘汰落后产业和产能是各省份产业政策的目标之一。在此背景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出口比较优势存在负相关也与本文的预期符合。此外,由工业增加值比重表示的产业结构与显示性比较优势呈正相关,说明工业规模越大,出口行业越多,产品的比较优势越大。此外,FDI 和 OFDI 的系数为正,且均不显著,并未发现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提高比较优势的证据^②。加入地区虚拟变量后发现,虚拟变量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东部地区的出口比较优势更高,这符合我国贸易优势地区分布的事实。

表 1 基准回归和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BE	0.427 *** (8.05)	0.412 *** (7.32)	0.409 *** (6.19)	0.383 *** (5.65)	0.329 *** (11.24)	0.304 *** (10.37)	0.276 *** (9.92)	0.239 *** (8.56)
IE	0.151 *** (3.96)	0.118 *** (3.07)	0.146 *** (3.79)	0.135 *** (3.32)	0.197 *** (5.08)	0.203 *** (5.34)	0.205 *** (5.40)	0.192 *** (4.87)
KL		0.170 ** (2.48)	0.126 * (1.64)	0.147 * (1.81)		0.131 * (1.68)		0.142 * (1.77)
HC		0.388 *** (5.04)	0.350 *** (4.37)	0.349 *** (4.37)		0.361 *** (4.84)		0.332 *** (3.76)
KC		0.312 * (1.69)	0.287 (1.44)	0.274 (1.20)		0.210 (1.02)		0.177 (0.86)

^① 出口恶化的典型事实:以工业品出口为例,本文利用 UN Comtrade 统计数据库计算了中国 2009—2016 年按照国际贸易标准产业分类 (SITCRev3) 的中国 35 个两位数行业(合计 235 种产品)的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发现就有 17 个行业(合计 102 种产品)在研究区间内处于比较劣势。

^② 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全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由 2009 年的 51.9% 下降到 2015 年的 31.3%。制造业各行业出口占全部产品出口的比重极高,流入到制造业的 FDI 下降,也说明近年来 FDI 对我国出口比较优势变化影响的新特征。

变量	(1)	(2)	(3)	(4)	(5)	(6)	(7)	(8)
<i>ER</i>			-0.250*** (11.56)	-0.209*** (-9.75)		-0.150*** (-6.76)		-0.129*** (-5.89)
<i>IS</i>			0.206*** (12.93)	0.201** (12.84)		0.102** (6.18)		0.089** (4.58)
<i>FDI</i>				0.072 (0.92)		0.108 (1.34)		0.084 (1.07)
<i>OFDI</i>				0.034 (1.13)		0.027 (0.97)		0.020 (0.84)
<i>L.LA</i>					0.461*** (11.40)	0.566*** (17.32)	0.391*** (7.21)	0.372*** (5.31)
<i>D</i> (是否为东部)	0.022*** (17.38)	0.020*** (13.48)	0.020*** (8.28)	0.018*** (6.43)	0.024*** (17.88)	0.021*** (12.46)	0.022*** (15.15)	0.017*** (5.23)
<i>F</i> 或 <i>Wald</i> 检验	109.97 (0.00)	180.46 (0.00)	343.12 (0.00)	694.61 (0.00)	188.12 (0.00)	326.55 (0.00)	219.90 (0.00)	894.21 (0.00)
<i>Hausman</i> 检验	76.84 (0.00)	88.61 (0.00)	86.94 (0.00)	88.07 (0.00)				
<i>Anderson LM/</i> <i>Arellano-Bond AR(1)</i>					11.81 (0.01)	8.90 (0.02)	-2.28 (0.02)	-1.83 (0.07)
<i>Cragg-Donald Wald F/</i> <i>Arellano-Bond AR(2)</i>					3.58 (16.85)	3.02 (16.85)	1.05 (0.29)	0.63 (0.53)
<i>Sargan</i>					4.88 (0.56)	6.85 (0.23)	9.88 (0.16)	10.12 (0.12)
模型	<i>FE</i>	<i>FE</i>	<i>FE</i>	<i>FE</i>	<i>IV(2SLS)</i>	<i>IV(2SLS)</i>	<i>SYS-GMM</i>	<i>SYS-GMM</i>
观察值	217	217	217	217	186	186	186	186

注:参数括号内为 *Z* 统计量的值; *F* 检验、*Hausman* 检验、*Anderson LM* 统计量、*Arellano-Bond AR(1)* 统计量、*Arellano-Bond A(2)* 统计量、*Sargan* 统计量检验值括号内为对应的 *P* 值; *Cragg-Donald Wald F* 检验值括号内为相应的临界值; **、*、* 分别表示 1%、5%、10% 的检验水平下显著; 工具变量为滞后 1~2 期的每万人拥有的外资企业数和国有企业数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2) 内生性讨论与结果分析。

①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企业家精神也可能是内生的,将其当作外生变量回归得到的参数估计值可能是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的发展会催生企业家精神效应,一些企业出现和成长因国际贸易而产生和壮大,因此,企业家精神与贸易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利用外资企业家精神和国有企业家精神的总和作为工具变量,其理由是:首先,企业家精神不仅表现在私营企业领域,在外资企业中,更是广泛存在企业家精神。考虑到外资企业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本质上是外资企业利用其自身优势在华发挥企业家精神的过程,而且其拥有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的现代管理经验,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到我国本土企业家精神。外商直接投资是低收入国家创业活动的主要来源(Acs & Virgill, 2009),且能够增加东道国创业机会(Clercq 等, 2008)。因此,私营企业家精神与外资企业家精神可能存在较大关联性,这是本文选择外资企业家精神作为工具变量的前提。其次,在对外开放浪潮中,也不能忽略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存在。尤其是伴随国有企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经验,国有企业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实施组织管理变革,设立新公司,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加快“走出去”开辟新市场,无疑都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李新春(2000)的研究表明,在主管部门表现为具有创新和改革精神的企业家型政府在选拔用人机制上任用具有很强企业家精神的经理时,国有企业能够克服一些企业家甄别机制扭曲或失灵情况,仍然有效地实现企业家的创业创新过程;胡永刚、石崇(2016)研究了管制和法治分别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部门企业家精神的数量效应和配置效应。

此外,外资企业家精神和国有企业家精神与出口比较优势之间更可能存在单向联系,这是因为,通常受企

企业家精神支配, 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扩大贸易, 提高产品规模和种类, 反过来, 国有企业的首要目标并非贸易, 外资企业首要目标是市场利润, 因此, 贸易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可能要比对私营企业家精神小得多。

由于缺乏 2011 年后各省份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 本文对外资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国有企业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计算在借助于式(3)时, 仅使用各省份国有企业数量与外资企业数之和除以人口数量表示。由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创设和发展通常比私营和个体企业设立时具有的要害禀赋数量更多, 要素质量更高, 所以, 本文假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的数量与其相应的企业家创业精神相匹配。各省份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出于相似的原因, 企业家创新精神也存在内生性的可能。李宏彬等(2009)在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工具变量的选择上, 均使用滞后 30 年的国有企业职工数占职工总数的比例表示。本文借鉴了这一思路, 同样也将每万人拥有的外资企业数和国有企业数视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工具变量。

② 内生性检验结果分析。表 1 后 4 列列示了企业家精神作为内生变量进行 IV 和系统 GMM 估计。首先, 在球型扰动项假定下, 2SLS 估计是最有效率的, Anderson LM 统计量、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Sargan 统计量均通过了检验, 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其次, 在扰动项存在异方差或自相关时, 则 GMM 估计结果更为有效。Arellano-Bond AR(2) 统计量、Sargan 统计量也都满足相关检验, 满足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 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有效。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 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回归参数均大于 0 且都显著, 这进一步验证了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出口比较优势效应为正的结论。在 IV 估计和系统 GMM 估计下, 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系数比 FE 估计的系数小, 但前者参数统计量的值比后者要大, 也说明考虑内生性的估计更有效率。

2. 进一步研究: 分位数回归和不同衡量视角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1) 基于分位数回归分析。以上回归不能精确地描述企业家精神对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变化范围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 且易受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再次对估计方程进行了回归。分位数回归利用解释变量的不同分位数得到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分布的分位数方程。当自变量对因变量不同部分的影响不完全相同时, 相比其他估计方法, 它能够更加直接和全面地捕捉到分布的尾部特征, 从而得到更加细致的刻画, 而且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比 OLS 回归系数估计更稳健。本文得到了 10% 分位、25% 分位、50% 分位、75% 分位和 90% 分位五个代表性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结果表明, 企业家精神的贸易效应仍为正, 但随着分位数的增加, 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分位数系数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这表明, 企业家创业精神对比较优势大的地区而言, 其促进效应更大; 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单调增加, 即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出口比较优势效应是递增的。这说明, 企业家创新精神是出口比较优势提升的持续动力, 其可能的原因是, 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在于创新, 源源不断的创新有利于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能够维持和提高其比较优势, 而企业家创业精神主要是促进企业数量增加和就业增长, 它需要通过企业家创新精神间接影响出口比较优势。除外商直接投资(FDI)外, 其余各控制变量的符号也都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一致^①。外商直接投资(FDI)系数波动较大, 只有在 75% 分位下显著为正, 这说明, 在较高分位数时, 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比较优势的条件分布的影响较明显。可能的原因是, 目前我国多数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放缓, 而且由于各地区制造业成本上升, 利润下降, 大量的外资从制造业流出, 转而流入到金融等服务业, 这对我国各地区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产生相当大的冲击。

表 2 分位数回归回归结果

变量	Q(10%)	Q(25%)	Q(50%)	Q(75%)	Q(90%)
BE	0.712 ** (2.10)	0.281 ** (2.50)	0.514 ** (2.41)	0.752 *** (11.60)	0.838 *** (7.31)
IE	0.091 ** (2.51)	0.102 ** (2.22)	0.225 *** (7.89)	0.461 *** (4.91)	0.557 ** (2.42)

^①分位数回归中, 主要关注企业家精神变量系数的大小和方向变化规律, 控制变量的分析与之类似。

变量	Q(10%)	Q(25%)	Q(50%)	Q(75%)	Q(90%)
<i>KL</i>	0.070* (1.67)	0.171*** (3.17)	0.207** (2.39)	0.290* (2.67)	0.257 (0.85)
<i>HC</i>	0.349* (1.90)	0.524* (1.79)	0.857*** (6.11)	1.140*** (6.93)	0.888*** (4.85)
<i>KC</i>	0.241 (0.81)	0.284 (1.22)	0.476* (1.73)	0.621 (1.10)	0.778 (0.57)
<i>ER</i>	-0.525*** (-3.46)	-0.327*** (-3.62)	-0.105** (-2.26)	-0.384*** (-2.42)	-0.689*** (-3.41)
<i>IS</i>	0.036** (2.09)	0.046*** (6.38)	0.132*** (5.48)	0.145*** (3.60)	0.472*** (8.49)
<i>FDI</i>	0.057 (0.83)	0.093 (0.94)	-0.045 (-0.72)	0.159* (1.68)	0.097 (0.99)
<i>OFDI</i>	0.014 (0.79)	0.035 (1.28)	0.089 (0.83)	0.099 (1.62)	0.066 (1.64)
<i>D</i> (是否为东部)	0.007*** (16.79)	0.011** (23.33)	0.023*** (25.21)	0.013** (21.20)	0.011*** (19.37)
常数项	0.087** (3.50)	0.112*** (3.19)	0.009* (1.67)	0.124** (2.05)	0.170** (2.30)
<i>R</i> ²	0.21	0.16	0.13	0.24	0.21

注:使用自抽样稳健标准差进行估计;系数括号内为t统计量值;抽样次数 Bootstrap 为 1000 次;***、**、* 分别表示 1%、5%、10% 的检验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2) 替代解释变量检验分析。不少文献使用企业数增长率或雇佣人数增长率表示企业家创业精神,本文通过同时捕捉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数量增长效应和就业增长效应来表示企业家创业精神。具体而言,利用式(3)右边当期的数值除以上期数值,并减去 1,得到用人均私营和个体企业数量的增长率与私营和个体企业就业人数比重变化率之积表示的企业家精神指标。此外,本文放松对企业家创业精神测算的限制,还利用私营和个体企业数量的增长率作为企业家创业精神的代理变量。

相比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是最重要的一种,也最能体现技术进步。企业家创新精神分别采用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授权量增长率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表示。其中,各省份每万人拥有的发明专利授权数的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本文使用 GMM 法降低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选择滞后 1~2 阶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作为工具变量。

按照上述测算企业家精神的顺序,本文得到了不同测算方法下的四种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四种不同的回归结果对比发现,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各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均为正向促进,这再次验证了前文的结论。不同的是,同时考虑企业数量变化及其雇佣人数变化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其回归系数非常稳定且显著(如表 3 前 2 列所示),而单纯从企业数量变化角度考察企业家创业精神时,其回归系数的稳定性较差且变为不显著(如表 3 后 2 列所示)。对此,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测算方法背后的含义不同,若仅用企业数量变化表示企业家创业精神时,一方面,由于同一地区的企业数量增长变化并不稳定;另一方面,它只是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数量反映,能否对该地区出口比较优势产生影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该方法表示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可能是不显著的,其结果也可能不稳定。

表 3 替代性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i>BE</i>	0.005*** (7.68)	0.007*** (2.40)	0.007 (0.58)	0.113 (0.69)
<i>IE</i>	0.002** (2.26)	0.002** (2.30)	0.001*** (3.59)	0.002* (1.85)

变量	(1)	(2)	(3)	(4)
<i>KL</i>	0.027 ** (2.42)	0.011 ** (2.60)	0.009 ** (2.79)	0.015 *** (3.30)
<i>HC</i>	0.012 ** (2.37)	0.008 * (1.93)	0.269 *** (4.90)	0.034 *** (4.33)
<i>KC</i>	0.412 *** (3.02)	0.265 (0.99)	0.412 ** (2.13)	0.363 * (1.76)
<i>ER</i>	-0.125 *** (-4.57)	-0.229 *** (-12.88)	-0.106 *** (-6.89)	-0.191 (-1.20)
<i>IS</i>	0.117 * (1.86)	0.194 *** (4.14)	0.019 * (1.79)	0.089 *** (2.46)
<i>FDI</i>	0.480 (1.37)	0.268 (1.21)	0.202 (1.49)	0.211 (0.63)
<i>OFDI</i>	0.045 (1.33)	0.189 (0.76)	0.076 ** (2.04)	0.091 (0.90)
<i>L.LA</i>	0.309 *** (14.48)	0.305 *** (21.61)	0.336 *** (65.52)	0.311 *** (41.53)
<i>D</i> (是否为东部)	0.011 ** (2.36)	0.011 ** (2.36)	0.012 *** (6.20)	0.009 ** (5.92)
<i>Arellano-Bond AR</i> (1)	-1.86 (0.06)	-1.72 (0.08)	-1.74 (0.08)	-1.68 (0.09)
<i>Arellano-Bond AR</i> (2)	1.21 (0.22)	1.22 (0.22)	1.17 (0.24)	1.17 (0.24)
<i>Sargan</i>	17.74 (0.99)	22.75 (1.00)	15.17 (1.00)	21.45 (0.99)
模型	<i>SYS-GMM</i>	<i>SYS-GMM</i>	<i>SYS-GMM</i>	<i>SYS-GMM</i>
观察值	186	186	186	186

注:参数括号内为 *Z* 统计量的值;Arellano-Bond AR(1) 统计量、Arellano-Bond A(2) 统计量、*Sargan* 统计量检验值括号内为对应的 *P* 值;***、**、* 分别表示 1%、5%、10% 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工具变量为滞后 1~2 期的每万人拥有的外资企业数和国有企业数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3. 机制研究:企业家精神影响出口比较优势的机制检验与分析

没有企业家,整个社会就缺乏资本、劳动和技术机制,企业家精神的多寡将促进或抑制经济发展。Cumming 等(2014)的研究表明,与风险态度相联系的法律、制度和障碍降低了企业家精神的有效性,影响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效应。从理论上讲,只有当产生的收益超过来自法律、制度和障碍的相关成本时,企业家可能设立新企业或者强化内部创业,进而对出口比较优势产生影响。而一个地区的法治水平、政府管制、不确定规避对企业家精神可能产生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而会影响到企业家精神与出口比较优势的关系。随着中国法治水平的进步,政府放松对市场的干预,各地营造“宽容失败、崇尚成功”文化氛围,它们在企业家精神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中发挥什么作用呢?

为检验法律、制度、文化因素在企业家精神的贸易效应中的调节作用的方向和大小,本文借鉴 Cumming 等(2014)的企业家精神对出口强度影响的理论机制检验模型,构建了法治水平、政府管制、不确定性规避分别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变量的交互项模型:

$$RCA_{i+1} = \alpha_1 BE_{it} + \alpha_2 IE_{it} + \alpha_3 Law_{it} + \alpha_4 IE_{it} * Law_{it} + \alpha_5 IE_{it} * Law_{it} + \mu_{it} \quad (6)$$

$$RCA_{i+1} = \alpha_1 BE_{it} + \alpha_2 IE_{it} + \alpha_3 Ins_{it} + \alpha_4 BE_{it} * Ins_{it} + \alpha_5 IE_{it} * Ins_{it} + \mu_{it} \quad (7)$$

$$RCA_i = \alpha_1 BE_i + \alpha_2 IE_i + \alpha_3 UA_i + \alpha_4 BE_i * UA_i + \alpha_5 IE_i * UA_i + \mu_i \quad (8)$$

式(6)中,*Law* 表示法治化水平。本文使用王小鲁等(2017)编制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来表示法治水平,该指数由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四个一级指标构成,这里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由律师人数和注册会计师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来

衡量,它也反映了法治化水平。显然,该指数取值越大,代表的法治化水平越高。

式(7)中, I_{ns} 表示政府管制。本文使用王小鲁等(2017)编制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衡量政府管制,该指数包含缩小政府规模、减轻农村居民的税费负担、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五项一级指标,该指数反向度量政府管制程度,其取值越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越小,反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越优。为理顺变量含义的方向,本文使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倒数作为政府管制的正向代理变量。

式(8)中, UA 表示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本文利用当前文献中提供的各省份文化差异的权威调查数据,研究与风险相联系的文化因素在企业家精神的贸易效应中的调节作用。赵向阳等(2015)根据与工作和管理有关的文化标准,采用 GLOBE 文化习俗问卷调查了 31 个省份的文化类型,涵盖了地理、历史、人口、宗教信仰、语言、经济、政治、法律因素。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基于该研究的成果可以研究区域文化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如何影响创业活动和经济发展。在实证检验中,本文选择了与企业家冒险态度或承担风险相联系的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代表文化因素。由于赵向阳等(2015)提供了一年数据,且调查在 2010—2011 年进行,因此,本文分别对 2011—2012 年的 RCA 指数和 2010—2011 年的其他自变量取算术平均值,建立式(8)的横截面模型。从图 2 可以看出,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最高的前十个省市为江苏、宁夏、湖北、吉林、上海、山东、浙江、西藏、安徽、新疆,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最低的十个省市为海南、贵州、辽宁、青海、四川、河北、云南、重庆、甘肃、北京。不确定规避程度高低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无严格的单调关系^①,例如,江苏、浙江、上海等一些东部开放度很高的省份,其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很高,四川、青海、贵州、云南、甘肃等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其不确定规避程度很低。再结合图 1 展示的企业家精神指数在各地区的表现,不确定性规避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变得复杂化。本文需要对不确定性规避代表的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贸易效应进一步地进行计量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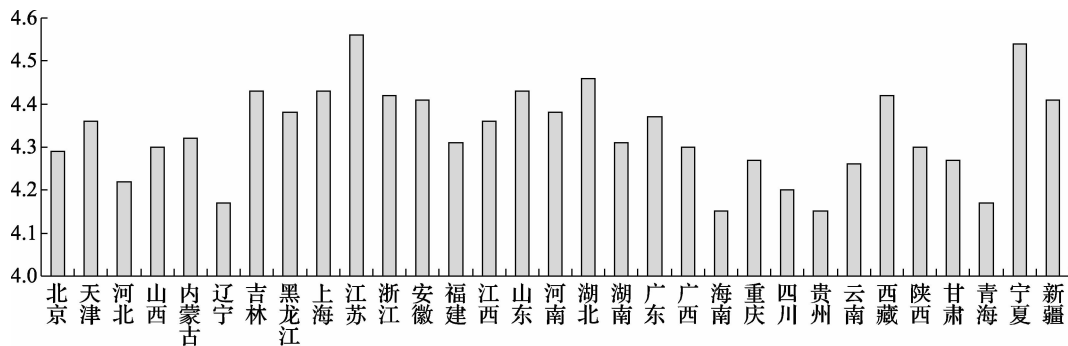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各地区不确定性规避指数
注:原始数据自赵向阳、李海、孙川(2015)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绘制

表 4 分别列示了法治水平、政府管制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在企业家精神的贸易效应中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在含法治因素模型中,为降低共线性风险,本文分别报告了法治水平与企业家创业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交互项模型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法治水平系数为正,这表明,法治水平上升有助于提高出口比较优势,在此前提下,企业家创业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与法治水平精神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法治水平的提升在企业家创业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出口比较优势效应中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法治水平进步,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能够得到更好地释放,在贸易争端、摩擦中能够直接提高本国企业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因此,企业家精神的贸易偏效应随着法治水平的提高而增大。

^①这一关系并不违背常识。比如,在国际层面上,美国和日本同为发达国家,但日本的不确定规避程度要高于美国,而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与美国一样较低。

表 4 企业家精神的贸易效应中调节机制检验结果

法治水平的调节作用			政府管制的调节作用			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的调节作用		
<i>BE</i>	0.245 * (1.78)		<i>BE</i>	0.364 ** (2.13)		<i>BE</i>	0.137 ** (2.35)	
<i>IE</i>		0.085 *** (3.84)	<i>IE</i>		0.235 *** (3.84)	<i>IE</i>		0.116 *** (5.28)
<i>LAW</i>	0.001 *** (3.43)	0.001 *** (4.71)	<i>Ins</i>	-0.002 ** (1.98)	-0.001 *** (4.71)	<i>UA</i>	0.110 (1.12)	0.131 (1.23)
<i>BE * LAW</i>	0.037 *** (2.86)		<i>BE * Ins</i>	-0.087 *** (-3.12)		<i>BE * UA</i>	0.017 *** (3.98)	
<i>IE * LAW</i>		0.155 *** (6.82)	<i>IE * Ins</i>		-0.007 * (-1.82)	<i>IE * UA</i>		0.026 *** (5.43)
<i>F</i> 检验	84.98 (0.00)	76.07 (0.00)	<i>F</i> 检验	357.03 (0.00)	329.85 (0.00)	回归方法	OLS + 稳健标准误	OLS + 稳健标准误
<i>H</i> 检验	100.52 (0.00)	55.06 (0.00)	<i>H</i> 检验	6.86 (0.03)	11.07 (0.00)	<i>R</i> ²	0.12	0.14
<i>R</i> ²	0.23	0.25	<i>R</i> ²	0.25	0.28			

注:含法治水平、政府管制的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在其中控制了个体效应,但放松对时间效应的控制;在含与不确定规避程度相联系的文化模型中,关注了异方差问题;因主要考察核心变量的系数,故省略了常数项;***、**、* 分别表示 1%、5%、10% 的检验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在含有政府管制因素的模型中,同样也为了减少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单独列示了企业家创业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与政府管制交互模型的估计结果。回归结果表明,政府管制的系数显著为负,政府管制对出口比较优势有直接的消极影响,因为对市场管制过多,企业家经营和出口的灵活性受到限制。交互项系数均为负数,即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贸易偏效应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贸易偏效应均随着政府管制的提高而下降。

在与风险相联系的文化因素模型中,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的系数均为正,不显著,但它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也就是说,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不会导致出口比较优势的丧失,而且随着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越高,它对企业家精神的贸易正向调节效应越大。本文的发现与 Cumming 等(2014)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差别。关于这一点,本文有以下原因:一是数据限制,地区层面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指数缺乏连续性,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在企业家精神的贸易效应中发挥的调节作用被局限在某一时刻,而且其他文化变量数据的可得性也限制了变量的使用;二是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低)限制(鼓励)企业家冒险的倾向,但同时还能够提高(降低)企业家从事经营和贸易活动的积极性。比如,企业家更倾向于希望国际贸易中汇率能够稳定或可以预见,合同条款能够更加具体。因此,本文认为,不确定性规避程度指数对在中国情境下企业家精神的贸易效应产生的正向调节作用可能是合理存在的。

五、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 2009—2015 年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对中国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家创业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均能显著提升中国地区出口比较优势。处理了企业家精神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且利用分位数回归和替代性解释变量进行检验,该结论具有很强的稳健性。(2)分位数回归中,企业家创业精神对显示性比较优势的积极作用先下降而后上升,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出口贸易比较优势效应单调递增。这反映了企业家创业精神产生的贸易效应的复杂多变性,

企业家创新精神对贸易的影响更具有单调性。(3)对影响机制的分析表明,法治水平在企业家精神的贸易效应中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而政府管制的这种调节作用的方向与前者相反,当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作为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时,它能够正向影响企业家精神的贸易偏效应。此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强度、知识资本强度、产业结构对出口比较优势有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强度产生的影响为负,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2. 启示

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中国情境下企业家精神与出口比较优势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家精神是出口比较优势的驱动力。大力培植企业家精神是提升贸易比较优势的的重要途径,这很好地解释了民营经济发达的外向型东部地区,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厚植了贸易比较优势。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要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不仅要注重创业创新活力,还要注重创业创新的质量,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在专注于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增长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构建促进企业成长和壮大的机制。创业创新政策吸引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创造创新,才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和贸易竞争力提高。本文的结论还表明,构建有利于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制度设计和法治环境,对于提升贸易竞争力而言至关重要。

本文认为,单纯地从企业数量角度来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进而分析其经济影响时需要慎重,因为企业数量的增加与产出增长并不总是相适应和相联系,企业数量与产出增长之间还有很多环节、机制并不能直接观察到。此外,本文计算的企业家创业精神指标很难体现出具有企业家创业精神的个人和企业特征,例如,开创性的思想、观念、个性、意志、作风和品质等,寻找多层面、可量化、数据可得性强的企业家创业精神指标,是未来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 [1] Abiodun T S.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Learning Orientatio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Reconfiguring Capabilities on Export Performance of SMEs in Niger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16, 2, (3): 33 - 42.
- [2] Acs Z J, Carlsson B, Thurik R. Small Business in the Modern Economy[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 [3] Acs Z, Virgill N. Entrepreneurshi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 2009.
- [4] Audretsch D, Dohse D, Niebuhr A.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A Regional Analysis for Germany[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0, 45, (1): 55 - 85.
- [5] Audretsch D B, Lehmann E E. Does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Hold for Regions? [J]. Research Policy, 2005, 34, (8): 1191 - 1202.
- [6] Audretsch D B, Keilbach M.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Growth: An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4, 14, (5): 605 - 616.
- [7] Balassa B.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65, 33, (2): 99 - 123.
- [8] Baumol W J.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 893 - 921.
- [9] Beugelsdijk S, Noorderhaven N. Entrepreneurial Attitude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section of 54 Regions[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4, 38, (2): 199 - 218.
- [10] Chaisingham N, Nguyen T H. The Impacts of Entrepreneurship on Export Orient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Family Ownership and Involv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2016, 19, (1): 1 - 24.
- [11] Cho Y 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earning Competence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Export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in Global Trade Environment[J]. 통상정보연구, 2014, 16, (2): 23 - 44.
- [12] Clercq D, Hessels J, Stel A J.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New Ventures Export Orientation[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1, (3): 283 - 303.
- [13] Cole M A, Elliott R, Shimamoto K. Why the Grass Is Not Always Greener: The Compe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Factor Intensities on US Specializatio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5, 54, (1): 95 - 109.
- [14] Cumming D, Sofia J, Zhang M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Comparing International Datasets[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4, 22, (2): 162 - 178.

- [15] Etchebarne M S, Geldres V, García R.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n Firms Export Performance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2.
- [16] Ezirim A C, Maclayton D W.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Export Marketing Performance [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0, (38): 57 – 77.
- [17] Fabling R, Sanderson L. Entrepreneurship and Aggregate Merchandise Trade Growth in New Zealand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10, 8, (2): 182 – 199.
- [18] Foster H, Krizan C, J. Market Selection, Realloc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the US Retail Trade Sector in the 1990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6, 88, (4): 748 – 758.
- [19] Gilbert B A, Audretsch D B, McDougall P P. The Emerg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4, 22, (3): 313 – 323.
- [20] Glaeser 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ity [R].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 [21] González-Pernía J, Peña-Legazkue I. Export-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5, 5, (3): 505 – 522.
- [22] Hébert R F, Link A N. In Search of the Meaning of Entrepreneurship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89, 1, (1): 39 – 49.
- [23] Khalida S, Bhattib K.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in Managing Partnerships and Partnership Knowledge Exchange: Impact on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in Export Expansion Stages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5, 50, (3): 598 – 608.
- [24] Lederman D, Rodríguezclare A, Xu D Y.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xtensive Margin In Export Growth: A Microeconomic Accounting Of Costa Rica's Export Growth During 1997—2007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6, 25, (5376): 543 – 561.
- [25] Leko-Simic M, Horvat J. Risk Taking Propensity and Export Performance of Croatian Exporters [J]. Managing Global Transitions, 2006, 4, (4): 313 – 326.
- [26]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 – 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 (6): 1695 – 1725.
- [27] Muñoz-Bullón F, Sánchez-Bueno M J, Vos-Saz A. Nascent Entrepreneurs' Personality Attribu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New Ventures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11, (3): 473 – 492.
- [28]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J]. General Information, 1934, 355, (1403): 159 – 192.
- [29] Virgill N.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Tools of Development or Reform Delay? [M].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08.
- [30] Wong P K, Ho Y P, Autio E.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GEM data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 24, (3): 335 – 350.
- [31] 陈刚. 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5, (6).
- [32] 程俊杰. 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6, (8).
- [33] 单豪杰. 中国资本存量 K 的再估算: 1952—2006 年 [J]. 北京: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10).
- [34] 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所课题组. 我国地区比较优势研究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01, (2).
- [35] 胡永刚, 石崇. 扭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 (7).
- [36] 蒋冠宏, 蒋殿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4, (5).
- [37] 蒋含明, 李非. 企业家精神、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3, (1).
- [38] 李宏彬, 李杏, 姚先国, 张海峰, 张俊森. 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9, (10).
- [39] 李小平, 卢现祥, 陶小琴. 环境规制强度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 [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2, (4).
- [40] 李新春. 企业家过程与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模型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0, (6).
- [41] 毛其淋, 许家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抑或抑制了企业出口? [J]. 北京: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 (9).
- [42] 欧雪银. 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新进展 [J]. 北京: 经济学动态, 2009, (8).
- [43] 王小鲁, 樊纲, 余静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44] 杨勇, 朱乾, 达庆利. 中国省域企业家精神的溢出效应研究 [J]. 北京: 中国管理科学, 2014, (11).
- [45] 赵向阳, 李海, 孙川. 中国区域文化地图: “大一统”抑或“多元化”?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5, (2).
- [46] 朱彤, 刘鹏程, 王小洁. 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J]. 天津: 南开经济研究, 2015, (5).
- [47] 庄子银. 企业家精神、持续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J]. 北京: 世界经济, 2005, (12).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LI Xiao-ping, LI Xiao-ke

(Economic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rade competitiven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release of entrepreneurship, what kind of impact will it have on regional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Will entrepreneurship be a driving force for China trade competitiveness? If so, what is the mechanism of its influence?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exports from export performance, export growth, export intensity, and export propensity, but none of them can explain the change of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well. Obviously, they can reflect the change in export scale,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promotion of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is is because only when the export scale increases to a certain extent,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can only be improved. Along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extends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export performance, export growth and export intensity to its impact on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is paper uses the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proposed by Balassa (1965), and combines with Location Quotient index jointly proposed by Investment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and Institute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o calculat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regional export.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divide entrepreneurship into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ir effects on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are tested respectively.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mere use of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may lead to the biased measure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Therefore,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effect and the employment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index at provincial level. We also consider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of econometric model, use the number of area per capita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entrepreneurship'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use GMM estimation to overcome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of dynamic model.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uses the reliable data obtained to tes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hina rule of law,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 the trade effect on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on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we have made a useful supplement to previous literatures.

In this paper, we construct the index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t provincial level, and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study of China 2009—2015 provincial panel data finds that both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hina export in the regions,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when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of the model. Quantil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export advantage of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is complex and changeable, while the influence of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on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monotonous and increasing; Further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shows that the rule of law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export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While the cultural attitude represented by uncertainty avoidance has a positive feedback mechanism on the export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show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design and the rule of law environment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promotion of export competitiveness.

In the new situation, we should vigorously stimulate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not only focus on entrepreneurship vitality,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Whe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ttract mor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t really promote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trade competitivenes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also show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design and the rule of law environment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de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rule of law; government regulation; uncertainty avoidance

JEL Classification: F14, L26

DOI: 10.19616/j.cnki.bmj.2017.09.005

(责任编辑:月 才)